

# 說故事的門

佐依子

從收集的CD架上找到一張白俄羅斯交響樂團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號交響曲，聽到第二樂章雙簧管吹奏出哀怨的主旋律時，不免讓人聯想到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：白俄羅斯的女作家亞烈塞維奇女士（Svetlana Alexievich, 1948-）筆下的故事。

她說她希望寫出來的作品是現代人在網路上找不到的，因為發生在她家鄉的事情，大部份是沒有被報導出來（或者應該說不能被報導）。而身為記者的她，將真相以文學的方式寫出來的作品，卻被俄羅斯當局歸類而成禁書，只有在黑市書店才能買到。

俄羅斯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（Dmitri Shostakovich, 1906-1975）說過一句話：為何蘇聯政府要檢查音樂家寫的曲子或作家寫的文章或詩？就因為這兩樣藝術實在「太重要」了，可以重要到會影響人民的思想與心境，所以都要通過檢查（censor）才能發表，如果內容「不當」，創作者就會被送到西伯利亞的改造營，永遠不如歸去，連逃的地方都沒有。就因為這樣，蕭斯塔科維奇每次寫完一首樂曲，呈給「上級」單位那天，他都不敢進家門，就怕警察半夜跑來抓他，控告說這首樂曲有「反政府」的色彩。當晚，他會站在家門口，一直到隔天沒有被抓走，他才會安心進入家門，因為他怕如果警察真的來，會嚇著他的小孩們。這是蘇聯時代作曲家的心境。

而得到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另外兩位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跟寫《齊瓦哥醫生》的巴斯特納克，也都是必須遠離家鄉，作品甚至無法在俄羅斯出

版，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寫作，世界不但擁抱他們的文字，甚至將他們化成電影、電視、音樂，完全沒有被鐵幕攔住。

亞烈塞維琪女士的作品《門》被愛爾蘭的導演拍成電影，在2010年的奧斯卡短片項目中被入選。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在1986年發生在車諾比的核爆事件後，一對夫妻與他們幼小的女兒被迫離開自己的公寓，但是住在避難所時，卻發現孩子早已是「核能外洩」的受害者，死期就在幾日之內。父親無法接受女兒就這樣離開人間，於是冒著危險回到原來住的地方（已經像一個死城），就是要將家裡的門拆下來當成女兒的靈柩，因為那道門是他自己的父親打造的，這樣女兒到天堂時至少是跟「家」在一起的。

短短的十六分鐘的描述，一種壓抑的不安情緒不禁讓人心中淌血。

這就是亞烈塞維琪說的：我要寫出人們在網路上看不到的事情，因為當時官方只說這個「核爆事件」有三十一人身亡，而世界不知道的是那幾十萬受到「遺害」的人們發生的事情，這個「門」只是其中的一個，卻已經讓人心碎。

有一位也是出生在白俄羅斯的畫家，今年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紀念，他是猶太裔的夏卡爾（Marc Chagall, 1887-1985）。

夏卡爾過世的城市，法國的魯貝市（Roubaix）最近為他展出了兩百多幅的畫作來紀念他，當然他

為Reims 與Metz兩個城的大教堂創作的彩繪玻璃已是永久珍藏。從1964年後，在巴黎歌劇院的天花板上，每位觀眾抬起頭時都會看到他畫的作曲家、歌劇與芭蕾舞劇裡之人物場景。當初所有的法國人都反對讓這位「外國藝術家」來為最以美感自誇的巴黎來做壁畫，但當時的文化部長馬侯（Andre Malraux, 1901-1976）堅持夏卡爾的風格是最適合的。

我想到亞烈塞維琪的「門」還有夏卡爾的畫作，他們的作品是來自白俄羅斯人的靈魂，卻打

入了世界的心坎裡。那股穿透的力量，是由最公平的「時光」來支持的，它幫忙我們忘記痛苦，也為人類考驗與篩選美好的藝術。來自白俄羅斯的作家與畫家的那篇「門」與那部「天花板畫」，都成為世界送給我們的禮物，請好好享受！

（本文作者為比利時國際伊莉莎白聲樂大賽得獎者、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、現任職於台北愛樂電台FM99.7晚間十點至十二點之帶狀節目）

## 出版訊息

書名：一封好長的信（Une si longue lettre）

作者：瑪莉亞瑪·芭（Mariama Bâ）。

譯者：邱大環。巴黎第三大學語言學博士，曾任巴黎第七大學、比利時皇家翻譯學院、塞內加爾高級管理學院等校之中文教師，在國內歷任台大、淡江及台師大副教授，亦曾擔任文建會駐巴黎台北文化中心主任及國家兩廳院藝術副總監。著有《塞內加爾的法語小說》、《法國文學小辭典》。譯有《生命有如繃緊的絲弦》、《還魂者》、《乞丐的罷工》、《哈喇魔咒》、《朱爾丹的瘋狂日記》。

出版社：南方家園

出版日期：2015/12/16

內容介紹：

二十世紀非洲百大好書

第一屆野間非洲文學獎得主

非洲女性書寫的經典代表作

「夢想在歲月和現實生活中逐漸消逝，我仍將它看為記憶裡的鹽，完整地封存在我的回憶中。」

「多年的生活經驗告訴我：傾訴可以減輕痛苦。我打開這本子，就當是寫給妳的回信，也當作是我在混亂日子中的支柱。」

這是女教師哈瑪杜萊在丈夫去世後，寫給摯友艾依莎度的一封信。

信中描述學生時代幸福的回憶，年輕人急切地希望改變世界的憧憬——這是塞內加爾在脫離法國獨立自主之後所帶來的希望。她也談到被強迫安排的婚姻以及婦女的處境。哈瑪杜萊更痛苦地揭露：她與丈夫廝守25年的愛情生活，在丈夫迎娶第二位妻子的那天，被徹底毀滅了。

被遺棄的她，如何與孤獨和悲傷共處？而丈夫去世後，哈瑪杜萊仍要面對難解的家庭關係、經濟上的重擔與愛情習題。但儘管有過失望與羞辱，她仍決定繼續尋找「幸福」的真義…

《一封好長的信》藉由一場喪禮，引導讀者瞭解塞內加爾最重要的習俗和文化，再談一夫多妻制衍生出的複雜情感生活，透過哈瑪杜萊的敘述，將讀者帶到塞內加爾家庭深處。瑪莉亞瑪·芭是第一位用銳利的筆，清晰地描述婦女在非洲社會的地位和處境的女性作家。

